

教科书修订的新旧模式及其对东亚历史争议的影响*

Falk Pingel, Georg Eckert 国际教科书研究所

[摘要]

两极世界瓦解后，国际教科书的修订范围和研究方法大大拓宽。现在，国际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学术与教学机构等很多专门机构都加入到了冲突后社会历史教科书与学校课程的修订工作中。新方法已不再将统一争议历史和冲突性集体认同感作为目标，而是将如何为以开放性、推论性和比较性态度处理争议性和敏感性问题提供对策为主要目的。现代教科书的修订必须以更加广泛的转型正义为背景。真相委员会、审判和补偿等问题将发挥一定作用。东亚会采用二战后欧洲的教科书修订模式吗？如何调整该模式并将其应用于这一地区的特定政治文化环境中呢？

关键词：国际教科书修订，和解，历史教学，冲突后教育，东亚

一. 挑战东西方民族主义的新世界秩序

苏联解体后，国际教科书的研究与修订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苏联的解体及其统治影响的结束，两极世界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趋于一体化。然而，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冲突和摩擦在所难免。新世界秩序因各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政治制度、社会现状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存在严重分歧。

新旧更替的过程并非总能得到和平解决。一方面，在苏联统治时期存在严重内部矛盾的两个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最终达成共识得以构建一个民主的后社会主义秩序。东德和西德在没有发生内部暴力冲突和外界武力干预的情况下和平统一。就连在苏联统治时期被抛弃的波罗的海诸国也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的情况下重获主权。

另一方面，对于某些国家，旧政权的势力依然顽固，为求变革而不得不以武力相见。罗马尼亚经过激烈的内战最终结束共产主义统治。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解体触发了二战以来欧洲最惨烈的战争，北约干预科索沃，欧盟成员国出兵波黑。乌克兰内忧外患，政治不稳定，动乱和公开暴力事件不时发生。整个高加索地区仍然内外冲突不断。个人独裁统治凌驾于民主进程之上，政治体制结构摇摇欲坠。少数民族仍为权利而抗争，领土争端和斗争导致公开暴力愈演愈烈，大有爆发战争之势。俄罗斯建立的新秩序尚不稳定，与车臣边界之争导致冲突不断。从苏联脱离出来的国家摩尔达维亚存在严重内部分歧，前景一片渺茫。摩尔达维亚聂斯特河以西部分欲并入西欧，并最终并入欧盟，以东部分则投向俄罗斯。俄罗斯曾军事干预高加索和摩尔达维亚。

* 本文以本人在欧洲和东亚地区国际教科书修订方面的经验为依据，而非作为东亚研究专家身份撰写。本人对东亚历史背景的了解依赖于对该地区教科书专家参与之专题研究、研讨会、讲座及其他相关会议的理解。在此，我要特别感谢 Takahiro Kondo、Biao Yang、Yao Bao、Un-suk Han 以及 George Eckert 研究中心的前同事 Claudia Schneider。我还要感谢东北亚历史基金会邀请我参与 2010 年 NAHF（东北亚历史基金会）研究基金资助计划。文章所述事实的准确性和适当性仅基于本人个人观点。

此外，20 世纪 90 年代的历史变迁并没有使所有国家得到解脱，塞浦路斯和北爱尔兰仍然冲突不断。北爱尔兰的政治争端本有希望得到解决，但至今仍未得到完全保障。塞浦路斯仍未统一，其东部由土耳其军队非法占领（依据欧盟和联合国国际法）。从整体上来说，塞浦路斯属于欧盟成员国，来自土耳其的冲突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个国家正在争取加入欧盟。因此，虽然上文中也曾提到一些积极的例子，但是很难说自苏联解体以来欧洲实现了全面的和平。

鉴于此，两极世界到全球一体化的转变对欧洲的影响甚于东亚。变革之风甚至波及到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越南。它们正在逐渐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向资本主义靠拢，借以维持一党专政和国家经济规划。这一转变促进了跨境经济合作和贸易与资本流通。从而为推动政治接触和协商奠定了基础。除少数边界争端外，两极世界的终结使得涉及地区趋于经济和政治稳定。虽然欧洲已经趋于稳定，但是冷战并未真正结束，朝鲜与韩国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台湾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另外，虽然中国现在经济突飞猛进，政治局势稳定，但是从长远来看，其对民主和边境少数民族运动的压制仍然承担着不可预测的风险。

这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欧洲周边地区仍遭受暴力冲突威胁，另一方面整个地区总体趋于稳定，人们沉浸在欧盟、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等跨大西洋机构构建下的国际与社会稳定和人权保障氛围中。二战带来的创伤已基本愈合，昔日的敌人已成为盟友。虽然自越南战争结束以来东亚国家一直生活在和平背景下，但是它们是否能像欧盟一样建立一个和平共进的联盟机构仍不得而知。二战给东亚国家带来的创伤仍未抚平。边界问题和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之间犯下的战争罪行带来的影响仍威胁着东亚诸国的和平关系。与欧洲不同，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并不会推动和平的发展，各国政策仍然在这一进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与欧洲不同的是，东亚国家虽然也经历了全球化进程，但它们仍保留着自己独有的民族化政治价值观。

尽管与欧盟机构相比，多数欧洲年轻人更加信任自身国家政治机构。然而，他们同时也认为欧盟组织对保障和平与人权等总体价值观来说更加强大和可信（Eurobarometre 72, 2010 年）。冷战乌云笼罩下的欧洲已经走向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之路，现有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都将很好地得到控制和解决，而东亚则没有形成这样一种“集体”政治价值观。虽然欧洲也存在经济竞争。但是，从战后结束之初，欧盟机构就开始在“西方”¹资本主义和“东方”共产主义背景下推动着经济复苏。欧盟既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财富再分配，又增强了弱势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能力。

东亚则没有形成类似框架，竞争依然激烈，缺乏节制。日本在经济方面的主导作用引起了新兴“经济共荣区”关于其是否会给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不便的怀疑。同样，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韩国在国际政治合作与协商程序中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没有被其他东亚国家看做是增强整个地区发言权和促进所有国家发展的优势，反而被认为是对其自身地位的一种威胁。冲突问题与和平合作通常以双边或多边国家层面为协商背景，却很少在超国家平台背景下进行，即使有也缺乏相应的影响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亚的外交体系与 1914 年之前的欧洲国家关系类似。那时欧洲各国经济快速繁荣发展，同时又害怕落后于竞争对手，猜疑和不信任心态日渐增长，最终导致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考虑到对此背景的认识和反省以及全球经济与政治的协作，繁荣发展的东亚似乎并不会步欧洲后尘，但是当今关于无人居住小岛的争端和媒体的激进

¹ “西方”是包括地理意义上的南欧和北欧在内的一种政治文化概念。它与代表苏联势力影响下的“东方”相对。

言论以及由之引发的国际安全争论却着实令人对其前景感到担忧。从中可以看出，情感因素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因此以合理方式理性解决相关问题迫在眉睫。

全球政治秩序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历史意识和彼此之间的看法。欧盟最初仅仅被看做是一种对经济合作的尝试，其在尚未完全实现的民主、人权、和平和社会安全以及未来希望与计划的共同促进，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引起人们的重视（Pingel, 1995 & 2000 年）。很多欧洲国家的历史教科书指出，柏林墙的倒塌不但意味着欧洲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合作、权利与竞争，也是未来社会正义和内外和平发展的一种象征。这一积极的欧洲意识形态不仅是对现实的反映，也是开启共同未来的一缕曙光。

直到两极世界终结，国际教科书修订主要把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关系内容作为联合教科书的重点。对“他国”的诠释模棱两可，对自身形象避而不谈。这种做法曾是跨越“铁幕”进行教科书会谈的前提条件。尽管这只是例外情况，但是如果避而不谈政治经济制度，苏联与美国教科书会谈和由德国主持的东欧诸国教科书研讨会（不仅包括了波兰，也包括了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无法顺利召开。

欧洲一体化进程将改变这一传统模式。鉴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越来越相似，从而也就没必要在教科书会谈中禁止相关论述了。此外，由于暴力冲突主要发生在周边，在欧洲中部主权国家之间举办冲突后教科书磋商会也就显得不那么必要了。但这并不是说比较性教科书会谈无关紧要。而是他们倾向于针对不同问题采取不同解决方法。欧盟法律、协定和条例对欧盟和欧洲委员会成员国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欧盟公民享受跨国家层次的权利，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义务。

为了构建对这一进程和历史根源的理解，欧盟在市政、地理和历史教学中大力推广“全欧意识”。由于无法延长这些课程的授课时间，欧盟主要将欧洲课题放在国家历史教学中。欧洲各国目前对这一做法仍存在争议（Kokkinos & Gatsotis, 2008 年；Capita 等，2004 年）。然而，这一问题却不能通过双边教科书会谈得到合理解决。为使深入讨论欧洲总体发展与加强对本国认识这两种要求协调一致，欧洲委员会、Georg Eckert 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欧洲历史教师协会、欧洲历史教育工作者协会等国际组织及各教育基金会或机构正努力推动学者、教育部门代表、教师和教科书作者积极参与多边研讨会和座谈会以商谈如何在课堂上讲解欧洲共同历史和共同空间（Crossroads, 2006 年；欧洲委员会，日期不详；欧洲历史教育工作者协会，日期不详；Georg Eckert 研究所，日期不详）。过去十年东亚国家虽然也曾涉及一系列多~~国~~历史课题，但是至今仍未实现协调一致的超国家合作。

二. 改变冲突解决和教科书修订模式

1. 战后模式：修正对他国形象的描述

二战结束后，战胜国立即强制德国和日本当局进行彻底的教育改革。其中包括撤销相关种族主义或军国主义教科书，解散教师，并颁布新的民主、非歧视性教育法规。经过第一阶段干预后，引入更多合作形式的再教育；占领国支持对独裁和专制传统持批判态度并接受和平教育理念的教科书作者和课程专家。占领结束后，保守派重新获得了对政府及机构的影响地位，撤消了部分再教育程序（Dierkes, 2010 年；Shibata, 2005 年）。

尽管在被占领时期德国与日本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从历史角度来说它们却存在很大差异。对德国来说，这是他们第二次失败。外国军队干预了德国领土争端，同盟国将其一分为二。相反，日本除冲绳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被占领的领土。除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列岛之外占领的领

土，它仍然保持了领土完整。由于仍允许日本天皇存在，传统的专制信仰态度并没有随着民主制度的引入而消失。天皇代表了日本的最高道德权威，所以仅对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少数主要军事领导人进行了制裁，而不像德国那样对整个政治或军事组织进行了审判。因此，集体罪责问题在德国引起了广泛思考，甚至影响了战后出生的年轻人的历史意识，但却没对日本造成太大影响（Nozaki, 2008 年）。过去多数德国人顶礼膜拜的政治思想体系完全瓦解。因此，为重新获取政治独立，德国接受了融入民主、多元“西方”和新建立的欧洲组织的建议。他们接受了合作和共同财富的超国家意识形态，同时保留了民族国家和民族感情，并将其置于更广泛的欧洲—大西洋背景中。亚洲或东亚并没有形成各自的超国家区域定位：朝鲜在经历战争和独裁之后深受打击，中国走向共产主义阵营，越南先是独立，然后又与日本的亲密盟友美国开战。日本与一战后的德国相似，日本领导阶层存在民族主义诉求与传统主义态度，受到左翼运动激进观点的影响。

德国国内和国际教科书修订始于被占领时期，并在 Braunschweig 国际教科书研究所于 1950 年成立后继续实施。该研究所不断邀请其他西欧国家及海外作者参与教科书研讨会，审查历史教科书，并在其国际年鉴上出版教科书审定文章（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1950 年）。欧洲委员会和其他欧洲机构不仅经常与该研究所合作，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协作关系，该组织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举办过多次世界性教科书修订研讨会，西欧各国及德国均有参与。尽管会议研究结果和建议基于对教科书的学术分析，但是它们并没有采用特别复杂的方法：通常只是解释性的定性内容分析，而几乎很少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一般来说，只会审查在用课本，而不会详细研究更广泛的教学环境和历史教学的政治分歧。尽管如此，这些活动仍然加强了将教科书作为社会主导“时代精神”的延伸并对其重要性予以关注的认识，并吸引了独立于修订过程之外对教科书研究的更多兴趣。这些兴趣催生了对教科书的纵向研究，也就是深化对作为叙述结构所基于事实选择背后国家意识形态和教育理念传播工具的教科书的理解（Fitzgerald, 1979 年；Altbach 等, 1991 年；Choppin, 1992 年；Marsden, 2001 年）。

亚洲/东亚并没有实施类似的教科书修订过程，此处说明的教科书研究也没有发展成为公认的学术分科。仅有日本、中国等部分亚洲国家偶尔会派代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全球性研讨会。有趣的是，这些研讨会主要针对亚洲教科书中对欧洲的相关叙述（Abraham, 1959/1960 年；Recommendations, 1959/1960 年），并没有就亚洲内部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国际教科书研究所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与日本建立了接触关系，Georg Eckert 研究所与日本国际教育信息学会一起举办了一系列教科书会议，商讨如何处理大会中各自提出的历史和地理教科书问题，而对诸如二战和战争罪行等争议性问题却保持沉默（Hillers, 1980 年）。仅在 1998 年 4 月在东京举办的联席会议上对此问题的争议进行了讨论（Henry & Riemenschneider, 1998 年）。上述日本合作研究机构还与其他国家举行了教科书磋商会议，但都沿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模式——仅批判性审查他国形象，这样日本就不会在国际教科书磋商会议中遭遇自身形象尴尬。尽管如此，与德国教科书研究人员建立的这种接触关系仍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家永三郎提出的建设性观点引起了日本国内对教科书的激烈争论，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Buruma, 1994 年；Saaler, 2005 年）。

在这一背景下，部分韩国和日本学者及教科书作者对欧洲人过去的艰辛做法进行了研究。他们试图采用欧洲做法来解决东亚争端。比如，近藤孝弘教授出版了对日本教科书修订的研究。韩国李泰永教授开始着力推动召开韩国和日本教科书分析会议。虽然很多会议文件都提供打印文本，但很少引起专家关注。会议对政治阶层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为两国间学者意见交流建立了桥梁，并为更加深入地研究日本教科书奠定了基础。韩国教育开发

院和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先后对国外教科书中的韩国形象进行了分析。这种单方面活动推动了一系列以为国外教科书提供“正确”信息并宣传正面韩国形象为目的的小范围研究。但是这种方法缺乏一种多边性和比较性态度（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日期不详；国际事务中心，日期不详）。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进行新一轮教科书修订时，东亚国家并没有对比较性、相互性和基于研究的教科书分析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2. 在转型正义框架内修订教科书

在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教科书修订主要集中在学校课本方面，而很少在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反思教育，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在更广泛的转型正义框架内对其进行思考²。殖民独立以及对独裁、专政和种族主义的抗争（尤其是在南美和非洲）过程发展出了一系列处理“负面历史”的教育、司法和金融工具。尽管它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术语，但是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就已经采用了构成转型正义的很多因素。除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等合理司法措施外，对国家官僚机构和政府的审查和清洗、再教育、补偿和赔款也包括在此之列。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涌现了各种新的机构，如：各种形式的真相委员会和以本国名义对犯下的罪行进行正式道歉。

除了在20世纪50年代结束占领后略有倒退外，德国当局在整个联邦共和国历史中一直努力处理转型正义问题。德国在被占领期间进行了物质赔偿，近些年又对奴隶劳工进行最后赔偿。由联邦政府和私人企业提供的部分赔偿金用于支付教育活动开支³。从1946年开始每年都会对犯下纳粹罪行的人进行审判。

与德国不同，自朝鲜战争以来日本社会并没有积极处理过去因战争罪行造成的后果。在冷战的影响下，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签署了相关协定，在日本政府清晰认识其帝国主义伤害和罪行并广泛研究和记录之前规定了对日本非常有利的条件并调整了战争赔款。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转型正义的综合框架并没有形成。新的历史争端再次将所有问题置于中国和韩国面前。教科书问题激发了对日本过去复杂历史的广泛争议，带来了沉重的政治包袱。与之相反，德国在教科书修订方面的做法减轻了“负面历史”带来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起，教科书问题就引起了对日本的争议，这种做法已经超出了教育范畴。另一方面，德国与西欧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相互合作，并在教科书修订问题上交换意见。德国已将历史教育看做是和解的最重要传播工具。

3. 对自我形象进行批判性审查

在新世界秩序背景下，武装冲突和战争结构发生了变化。直至二战结束，多数战争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发起。但是此后，涉及政治、种族、文化或宗教团体的内战不断增加。这种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为明显，因此冲突解决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Chojnacki, 2006年；Münkler & Camiller, 2005年）。对于内战，和平谈话通常不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派遣代表参加，而是在没有明确定义的国内社会、政治、文化团体之间举行。一般来说，各方必须寻求新的势力平衡来调和社会分裂分子之间的矛盾。

非政府组织通常在冲突后谈判和调解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可以独立于国家机构、或与之合作或将之取代并发挥作用。为避免内部冲突参与方意见偏颇，外部机构经常会作为中立

² 关于相关概念的更多信息，请登录国际转型正义中心主页 <http://www.ictj.org/en/tj/>。

³ 请访问“Erinnerung, Verantwortung, Zukunft（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主页 <http://www.stiftung-evz.de/eng/>。

调停方参与。非政府组织成为了处理内部冲突问题的推动力量。多数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课程改革完成了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到民主、多元思考的转变。国内外专家和非政府组织进行的深入经验交流推动了改革进程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相关方开展了一系列教科书研讨会和联合研究项目（de Keghel & Maier, 1999 年；Höpken, 1996 年）。转变过程中出现暴力冲突的国家通常只会在国际干预条件下才会进行教科书修订。国际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通过培训讲座提供了专家经验，促进了基于研究的处理方法的形成，发挥了调节作用，并帮助推广了研究成果（Koulouri, 2002 年；Dimou, 2009 年）。

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很多西欧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都经历了自我批判的历史辩论。法国通过更加现实的广泛采纳和平等合作评估平衡了人们对纳粹侵略抵抗运动的过高评价和过度英雄化。在法国历史教科书中，维希政权逐渐与抵抗运动占有了同样的篇幅。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阿尔及利亚战争才被公开认定为终结法国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Kohser-Spohn & Renken, 2006 年；Delissen & Abdelfettah, 2005 年）。此类批判性的内省过程一直饱受社会争议。法国政府最近试图颠覆反殖民主义思想态度，甚至通过立法强制教科书作者说明殖民主义的积极意义：促进殖民地人民的文明发展。经过激烈的政治和学术争论后，政府才不得不废除这一法律（Rémond, 2006 年）。意大利经过很长时间才将墨索里尼政权指定为历史教科书授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意大利当代史都只说到墨索里尼上台，而对之后发生的事件只字未提（Cornelissen, 2004 年）。波兰也在波兰反犹太主义深入讨论之后遭受强烈抨击，研究表明部分波兰人曾充当纳粹帮凶迫害犹太人（Polonsky, 2004 年）。没有这些自我批判讨论，就没有欧洲多国历史教科书。

21 世纪前十年欧洲转型国家的教科书修订进行顺利，而改革过程中出现暴力事件的地区仍在继续努力。此外，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了新型多边教科书工作的开展，突破了以国家为中心对历史教育的限制。代表几乎整个“西方”欧洲的多国作者小组编写了《欧洲历史教科书》，旨在传达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整合发展价值观（Delouche, 1993 年）。此教科书并不会取代正规国家教科书，而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资料。欧洲委员会、教师协会和非政府组织制定了包含诸多冲突地区邻国历史的区域性资料。参与德法青年交流的学生对此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们建议编制一种在德国和法国学校通用的历史教科书。两国政府认真考虑了这一意见，德国和法国出版社分别负责制定了以各自语言呈现的相同版本联合历史教科书。此教科书通过了德国和法国关于在校使用的认可（Le Quintreect 等, 2006 & 2008 年）。

从长远来看，东亚国家也将受到这种更为开放的国际氛围的有利影响。欧洲历史教科书的出现引起了韩国和日本的关注，于是出版了带有注释的翻译版本（教育中心, 1997 年）。20 世纪 90 年代下半叶形成了很多由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组成的双边和三边国家团体，致力于开发可在项目参与者所属国家内使用的联合教学资料。一方面，这些学者和教师可以在政府仍无力参与此类联合活动的条件下利用非政府主导历史教育协调工作新模式的优势。另一方面，他们的做法缺少像欧洲那样对相互接触、分析和逐步推进教科书修订的长远考虑。他们所作的工作与欧洲最后阶段一样，那就是提供联合资料。联合资料与“欧洲历史教科书”相似，但与涵盖两国课程的德法两国联合教科书相反，它只是一种课外资料。该资料提供创新的理念、诠释和方法，但官方机构可能会因其太过激进而不予采用。作者认为教师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仅向学生分发节选。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必通过当局审批。坏处是很多老师对其中的内容并不了解，因此很少使用。课业过于繁重使得学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学习正常课堂教学之外的这些补充资料。另外，教师可能会担心这种没有经过官方认可且有悖于主流国家史学的课堂资料会招致来自同行和家长的干预。

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三国教科书体系各不相同。中国不存在私人教科书市场，教科书的编制由教育机构统一指定和控制（Yang, 2001 年）。韩国和日本则允许私人出版社自行编制教科书，然后送交教育部门审批。日本文部科学省曾长期干预教科书编纂，有时甚至硬性规定涉及国家尊严和认同感等敏感问题的描述措辞（Chang, 2011 年；Nishino, 2008 年）。且不说这些差异，所有东亚国家的正式课程都有固定的官方表述特征，教科书作者和教师仅有有限的选择。经过审批的教科书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学生和家长只相信不存在社会争议的主流说法。此外，审查在统一学习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几乎没有为课外课题和有异于传统史学诠释的探讨的实验性教学留有任何余地。因此，由国外作者联合编著的补充性教学资料很容易被认为是为了迎合他国利益。

此外，补充资料不会给现有正规教科书带来改变，未来教科书作者是否会积极应对固有叙述的挑战尚不得而知。联合版本教科书并不受东亚政府支持，它被冠以另类政治色彩，深受严肃教育排挤。韩国后来涌现了大批民间团体，这种情况目前很难在中国出现。虽然日本也出现了类似团体，而且他们在历史反省方面表现得也很积极，但是这些活动是与左翼政治活动挂钩的，并不受国家当局支持，也没有对日本社会的传统历史观念产生多大影响（Yamane, 2009 年）。在过去十年中，日本与韩国之间结成的双边国家历史委员会主要关注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而很少涉足国内问题。委员会现在似乎陷入了僵局，因为双方在关于是否只限于课题研究或同时将教科书包括在内观点不一。中日委员会甚至从来就没有提及过教科书问题。起初，连非政府教科书方案都遵循传统的二战后教科书修订模式，这种修订只针对对他国形象的审查和修订。东亚教科书争议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因为日本。日本是唯一被要求修改教科书的国家，中国和韩国教科书中的历史观念却很少被要求接受审查。这种单方面做法忽略了自身形象与他国形象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对集体自我的定义意味着对不包括在此范围内的集体的排挤。

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在双方正式认同方面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它很难以一己之力推动研究成果作为一种价值观的认同。充其量也只能是为将来政府教科书协议奠定一定的基础。争端仍然两极分化：一方面来自右翼民族主义团体，另一方面来自左翼国际主义团体。为了将来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克服这种左翼与右翼以及民间团体活动和政治层面的谅解之间的两极分化。

三. 历史的去民族主义化：基于区域和研究的方法

为增强区域合作与区域意识，韩国将新的亚洲史分科引入了历史课程中。这一新学科可能会给中国和日本课程设计专家带来挑战，令其不得不深入考虑是否要摒弃排他性民族主义观念，转而采纳包容性区域观念。虽然在此问题上构建共同教科书这一想法尚不成熟，但是东亚国家（可能还包括越南）仍然可以共同制定东亚研究教学纲领。此方法将迎合关于日益凸显的与欧洲概念形成比较和对比的亚洲和东亚概念讨论（Lee, 2008 年）。这三个东亚国家的国际史或世界史教学通常更多地面向西方世界而非亚洲，因此区域性做法更加有用。然而，这一建议却遭到了日本和中国方面的质疑。相关方并没有抓住机会勾勒共同历史，而是怀疑韩国教育机构会捏造一个新的亚洲经济共荣区，这段时间韩国文化和解释性霸权占据主导地位（Chung 等，2009 年；Ijuin, 2011 年）。

扩大国际视野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历史“去民族主义化”。最近，中国在其历史课程中增加了国际内容，但并未在叙述中改变中国的中心地位。相反，新的全球视野应只反映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政策中承担的新角色。可以把它看作是在将过去中国教科书融入全球化背景和描

述中国在此过程中发挥的独一无二作用的条件下调整中国性传统观念的一种手段 (Xu, 2007 年; Vickers, 2006 年; Croizier, 1990 年)。应该像上海教科书作者编写的创新型世界历史教科书所说的那样, 不应该将其误解为将关注焦点由国家转移到全球。他们高估了上海当局在编制允许区别于北京中央课程以增进上海学生对城市与世界关系理解的教科书的回旋空间。他们编写的以文明理念为依据而淡化中国国家史的世界历史教科书超出了北京当局的容忍限度。该教科书引起了负面影响, 并最终被撤销 (Albers, 2009 年)。

对 20 世纪 40 年代中日战争期间逐渐形成的中国内战进行批判性评价仍然是不可能的, 更不用说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政权做出的致命性国内政治和经济决策曾经导致的巨大灾难了。中国学者和政治家经常批判日本的历史教学观念过于政治化, 但是很难说中国的做法就令人满意 (Z. Wang, 2008 年; Jones, 2005 年)。与之相反, 韩国将对自身形象的批判性审查和对“他国”的开放性描述联系在了一起。韩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通过对自身近现代史的修订进一步加快了参与共同国际教科书修订的步伐。对韩国专政和军事统治时期的批判性调研加深了对质疑传统愧疚叙述的日本问题的理解 (Han, 2011 年)。

日本国内对不断修改主流叙述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了争议。虽然大多数课本都进行了一些积极修改, 其传播也比极右思想影响更为广泛, 但是负面影响总会引起更多的公众关注, 尤其是在日本之外的国家 (Schneider, 2008 年; Saaler, 2005 年)。公众舆论和教师在修订传统解释方面表现得比政治家更为开放, 在过去的教科书中日本将侵略战争描述为自卫战争, 只列举了部分不当行为, 并称其在战争中不可避免, 或只是对敌方国家不当行为的一种抵抗。与教科书授课中所作的积极修改相比, 部分民族主义教科书对日本军队在战争中蓄意犯下的罪行和政治家参拜纪念战犯的神社的反动性行为的否认态度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 (Arai, 2010 年)。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否认日本为战争过错方的观点正在下滑, 虽然日本以外国家的媒体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纵向教科书研究表明, 日本教科书中对将妇女作为“性奴隶”进行虐待等问题的加工或忽略的做法随内部政治力量斗争而不断改变 (Sin, 2005 年)。

媒体对尚未达成成果的关注, 使得僵化的民族主义日本知识阶层形象更加突出。人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日本内部争议, 巩固认真对待日本战争罪行及日本侵略战争给邻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的人们的地位。如果主流政客不遵守相同的路线, 那么人们就无法认识到政客对罪行供认不讳符合新的道歉文化这一事实, 也不会将其看作是可信的和解出发点 (Dudden, 2008 年)。顽固行为仍然会影响外国人民对日本看待二战的态度看法。这一观点孤立了那些把修正二战历史教科书编纂看得比加强自身地位还重要的学者和教师。

事实上, 要使东亚历史去政治化并非易事。最近的一些历史项目很明显是与政治利益紧密相连的, 其学术严肃性和诚实性令人怀疑。他们应该对少数政治观点或领土主张予以明确辩论或反驳。如果韩国政府对中国东北工程 (Choe, 2009 年) 挑战做出回应, 并投入更大的资金以提高华北地区少数民族居民的韩国认同感, 那么他们也就站在了与中国做法相同的层面: 将历史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 (Ahn, 2005 年; Li, 2005 年; Lim, 2005 年)。这种做法将会削弱致力于教科书修订与邻国争议问题研究机构的学术声望和独立性。相关方本应对之做出更加有效的回应, 建立亚洲国家参与的国际研究项目, 就民族国家历史编纂和地缘政治 (如: 高句丽问题) 等问题积极讨论, 而不是拘泥于具体某一方面。同样的做法也适用于独岛问题。固执于该岛屿所有权的问题只会加深眼下的冲突。相反地, 如果能不追随当前政治利益, 就可以力求分析冲突状况, 并制定解决冲突的中立选择。问题不是独岛归谁, 而是为什么存在这一争议问题。基于此出发点, 东北亚历史基金会出版了相关刊物, 尽管其总体理论概念尚不成熟 (Bae 等, 2009 年; Kang, 2009 年)。此做法同样适用于东北工程问题。没有人反对研究华

北少数民族问题：问题是双方的政治认同结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一直在变，在这段时间里这一地区的所有权也几经更改（Seo，2008年）。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韩国科学与文明史计划”。一些国际知名研究人员被邀请参加这一计划。计划出版与科学文章相关的大量基础资料，并将其翻译成英语。他们应该向不熟悉韩国历史的国外研究人员提供原始内容，这样他们对东亚历史的印象就不会完全受日本和中国相关研究出版物的限制。韩国史学很少有国际语言版本，多数教科书作者和大学学者都对其不熟悉，因此引进大量原始资料 and 文章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一计划的推进符合韩国的长期国外利益。韩国正将自己置于不断变化的全球和区域背景中。它对国际组织和全球管理的积极参与将提升其国际地位，并增加韩国态度在区域问题上的影响力。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可以解读上述计划的大概目的了，那就是“取得与《中国科技与文明》及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和中国政府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相同的地位…”（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日期不详）。只要框架内的研究活动是自由的，这种与形象塑造利益之间的联系就不会给学术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另外，计划的目标不应该是长期构建与中国和日本国家史学“匹敌”的国家认同模式（Kim，2009年）。这样的目标将会与增进对相互关系和影响认识的上述新东亚方法背道而驰。

为了提高教科书修订工作的地位以按照独立于政治目标的方式进行表述，就必须正视以下问题：

1. 教科书修订必须包含教科书研究，并且它必须挣脱目光短浅的政治利益的束缚。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开展更多的纵向、比较研究，而且这些研究不能与以修订当前教科书或编制新的教科书为目的的计划联系过于紧密。此类研究对为以改变教育实践为明确目标的计划提供无争议背景资料是必不可少的。与其等待相关方做出更多可接受的政治道歉，教师和学者更应该努力地将更多精力放在专业学术和教学教科书工作上，并使其相对于政治影响更加独立。他们可以去除媒体中不断地统一修饰带有政治修辞的研究结果并要求日本政客叩首谢罪的论述，增加自身发言影响力。教师和研究人员将其工作价值与政治领域的短期影响挂钩的做法将会削弱其影响效力。经验表明，持续的专业活动可为那些希望在不改变正式课程框架的情况下逐步做出改变的相关学者、教科书作者和教师赢得更多支持（Pingel，2011年）。更加清晰的计划表明，研究结果越是基于严肃研究并独立于政治影响，将基于研究的教科书比较和修订作为不夹杂政治妥协的独立学科的机会就越大。
2. 为了完成基于实践和研究的计划，必须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计划应该尝试赢得合作或至少赢得主流教科书作者、教师和学者的参与，让他们加入到研讨会、培训讲座和研究活动中，从而改变教科书研究在学术界的次要地位。
3. 南亚/东南亚国家及越南研究人员和教科书作者的参与可以使辩论多元化。他们的参与可以抵消东亚国家之间的对抗行为。从新加坡或印度角度来看，日本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具有不同的意义。东南亚地区少数华裔的参与将给予中国性观念以确认和挑战，因为他们对中国认同有着自己的见解（Tu，1994年；G. Wang，2000、2003年）。韩国可以作为中立的和平调解方在全亚洲背景下发挥关键性作用。关于南亚/东南亚历史争议的开放性活动可以给所有相关方带来共赢。

参考文献

- Abraham, Herbert J. (1959/1960 年), Die Geschichte und Kultur Europas in den Lehrbüchern Asiens, 东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 *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für Geschichtsunterricht VII*, 117-146。
-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日期不详), *Strategic Initiative for Korean Studies*, 发起方: 京畿道城南市。
-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国际事务中心 (日期不详), *Understanding Korea Project*, 发起方: 京畿道城南市, 另请参见 www.ikorea.ac.kr。
- Ahn, Yonson (2005 年), Nationalism and the Mobilisation of History in East Asia: The “War of History” on Koguryŏ/Gaoguli, *Internationale Schulbuchforschung/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27*, 15-29。
- Altbach, Philip G. (1991 年), *Textbooks in American Society*, 纽约: Stat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社。
- Arai, Shinichi (2010 年), History Textbooks in Twentieth Century Japan: A Chronological Overview,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Memory, and Society*, 2(2), 113-121。
- Bae, Chinsoo (2009 年), *Territorial Issues in Europe and East Asia. Colonialism, War Occup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首尔: 东北亚历史基金会。
- Buruma, Ian (1994 年), *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 伦敦: Cape 出版社。
- Capita, Laura 等 (2004 年), A Decade of New History Education in Romania: Challenges, scandals, perspectives, 出自 Martin Roberts 编著的 *After the Wall: History Teaching in Europe since 1989*, 汉堡: Körber Stiftung 出版社, 286-294。
- 海外儿童教育中心 (1997 年), *History of Europe: An Anatomy*, 东京: Gakugei University 出版社 (日文版)。

- Chang, Seyoon (2011 年, 即将出版), *The Current History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he System of Textbook Authorization in Korea*, 出自 Han 编著的 *History Educ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汉堡: Peter Lang 出版社
- Choe, Kwang-sik (2005 年), *China's distortion of Goguryeo History and South Korea's Response*, 出自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Textbooks in Asian and Europe*, 87-122。
- Chojnacki, Sven (2006 年), *Anything New or More of the Same? Wars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46-2003*, *Global Society*, 20, 25-46。
- Choppin, Alain (1992 年), *Les Manuels Scolaires. Histoire et actualité*, 巴黎: Hachette 出版社。
- Croizier, Ralph (1990 年), *World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2), 151-169。
- Cornelißen, Christoph (2004 年), *Erinnerungskulturen: Deutschland, Italien und Japan seit 1945*, 法兰克福: Fischer 出版社。
- 欧洲委员会 (日期不详), *History Teaching website*, 2010 年 11 月 20 日 摘自 http://www.coe.int/t/dg4/education/historyteaching/default_EN.asp?
- 欧洲委员会 (日期不详), *Crossroads of European Histories - Multiple Outlooks on Five Key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斯特拉斯堡: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 出版社。
- Chung, Moongil, Choi, Wonsik, Baik, Youngseo & Jeon, Hyungjun (编辑) (2009 年), *East Asia as a Discovery*. 首尔: 东北亚历史基金会。
- De Kehgel & Maier, Robert (编辑) (1999 年), *Auf den Kehrlichthaufen der Geschichte? Der Umgang mit der Sozialistischen Vergangenheit*, 汉诺威: Hahnsche Buchhandlung。
- Delissen, Alain & Abdelfettah, Nedjma (2005 年), *Evasions & Obsessions - Differences and Repetitions in History Books: A Bipartisan Looks at the History of France's Colonisation of Algeria*, 出自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Textbooks in Asian and Europe*, 239-277。

- Delouche, Frédéric (1993 年), *Illustrated History of Europe: A Unique Guide to Europe's Common Heritage*, 伦敦: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第二版, 奎松市: Phoenix 出版社)。
- Dierkes, Julian (2010 年), *Postwar History Education in Japan and the Germans: Guilty Lessons*, 伦敦: Routledge 出版社。
- Dimou, Augusta 等编著 (2009 年),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Education in Southeastern Europe*, 哥廷根: V&R Unipress 出版社
- Dudden, Alexis (2008 年), *Troubled Apologies among Japan,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纽约: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社
- Eurobarometre 72 (2010 年 2 月), L' opinion publique dans l' union Europeenne, Rapport, Terrain: octobre - novembre 2009, 摘自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72/eb72_voll_fr.pdf
- 欧洲历史教师协会 (日期不详), *Historiana*, 2010 年 11 月 20 日摘自 <http://www.euroclio.eu/site/index.php/projects-mainmenu-125/current-projects-mainmenu-32/past-the-future-mainmenu-93>
- Fitzgerald, Frances (1979 年), *America Revised: History Schoolbook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波士顿: Little, Brown & Co 出版社。
- Georg Eckert 研究所 (日期不详), *Project Eurview*, 2010 年 11 月 15 日摘自 <http://www.eurviews.eu/de/start.html>
- Han, Un-Suk (2011 年, 即将出版), *The Politics of Remembrance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Domination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South Korea, 1945-2008*, 出自 Han 等人编著的 *History Educ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汉堡: Peter Lang 出版社
- Han, Un-suk 等编著 (2011 年, 即将出版), *History Educ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 汉堡: Peter Lang 出版社。
- Henrÿ, Roderich & Riemenschneider, Rainer (1998 年), *Deutsch-Japanische Schulbuchkonferenz zum Thema Modernisierung in Deutschland und Japan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Internationale Schulbuchforschung/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20, 336-341。

- Höpken, Wolfgang (编辑) (1996 年), *Öl ins Feuer. Schulbücher, ethnische Stereotypen und Gewalt in Südosteuropa/Oil on Fire? Textbooks, Ethnic Stereotypes and Violence in South-Eastern Europe*, 汉诺威: Hahnsche Buchhandlung 出版社。
- Ijuin, Ritsu ((2011 年, 即将出版), The Depiction of East Asian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in World History Textbooks in Modern Japan, 出自 Han 等人编著的 *History Educ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汉堡: Peter Lang 出版社
- 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für Geschichtsunterricht* (1950-1963/64 年), 第 1 至 9 卷; (1965/66-1977/78 年), 第 10 至 18 卷, 标题: *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für Geschichts und Geographieunterricht*
- Jeismann, Karl-Ernst & Hillers, Elfriede 联合编著 (1980 年), *Deutschland und Japan im Spiegel ihrer Schulbücher*, 不伦瑞克: Georg Eckert 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Schulbuchforschung。
- Jones, Alisa (2005 年), Chang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History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出自 Edward Vickers 和 Alisa Jones 联合编著的 *History,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st Asia*, 纽约: Routledge 出版社, 65-100。
- Kang, Sungho 等人联合编著 (2009 年),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Peace Building: The Role of NGOs in Historical Reconciliation and Territorial Issues*, 首尔: 东北亚历史基金会。
- Kim, Eunshil (2009 年), Problematizing the Issue of Cultural Identity within the Discourse of 'East Asia.', 出自 Moongil Chung, Wonsik Choi, Youngseo Baik 和 Hyungjun Jeon 联合编著的 *East Asia as a Discovery*, 首尔: 东北亚历史基金会。
- Kohser-Spohn, Christiane & Renken, Frank 联合编著 (2006), *Trauma Algerienkrieg: Zur Geschichte und Aufarbeitung eines Tabuisierten Konflikts*, 法兰克福: Campus 出版社。
- Kokkinos, Giorgos & Gatsotis, Panagiotis (2008 年), The Deviation from the Norm: Greek History School Textbooks Withdrawn from Use in the Classroom since the 1980s, *Internationale Schulbuchforschung/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30, 535-546。
- Koulouri, Christina (编辑) (2002 年), *Clio in the Balkans: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Education*, 塞萨洛尼基: 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Reconciliation in Southeastern Europe。

- Lee, Eun-Jeung (2008 年), East Asia Discourses in Contemporary Korea, 出自 Steffi Richter 编著的 *Contested Views of a Common Past. Revisions of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法兰克福: Campus 出版社, 181-201。
- Le Quintrec, Guillaume 等编著 (2006 年), *Histoire/Deutsch-Französisches Geschichtsbuch, Vol. 3: Europa und die Welt seit 1945*, 斯图加特: Klett 出版社 (另有法语版 *L' Europe et le monde depuis 1945*, 巴黎: Nathan 出版社)。
- Le Quintrec, Guillaume & Geiss, Peter 编著 (2008 年), *Histoire/Deutsch-Französisches Geschichtsbuch, Vol. 2: Europa und die Welt vom Wiener Kongress bis 1945*, 斯图加特: Klett 出版社 (另有法语版 *L' Europe et le monde du congrès de Vienne à 1945*, 巴黎: Nathan 出版社)。
- Li, Guoqiang (2005 年), Study on “the Northeast Project” and History of Northeast China, 出自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Textbooks in Asian and Europe*, 123-145。
- Lim, Jie-hyun (2005 年), Rescuing Goguryeo from the Nation: Beyond the Paradigm of “National History.”, 出自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Textbooks in Asian and Europe*, 65-83。
- Marsden, William E (2001 年), *The School Textbook: Geography, History and Social Studies*, 伦敦: Woburn Press 出版社。
- Münkler, Herfried & Camiller, Patrick. (2005 年), *The New Wars*, 剑桥: Polity Press 出版社。
-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Textbooks in Asian and Europe* (2005 年), 首尔: 韩国文化信息中心/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 Nishino, Ryota (2008 年),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Textbook in Japan, with Particular Focus on Middle-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ca. 1945-1995, *Internationale Schulbuchforschung/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30, 487-514。
- Nozaki, Yoshiko (2008 年), *War Memory,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Postwar Japan, 1945-2007: The Japanese History Controversy and Ienaga Saburo's Court Challenges*, 伦敦: Routledge 出版社

- Pingel, Falk (编辑) (1995 年), *Macht Europa Schule? Die Darstellung Europas in Schulbüchern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 法兰克福: Diesterweg 出版社
- Pingel, Falk (2000 年), *The European Home: Representations of 20th Century Europe in History textbooks*, 斯特拉斯堡: 欧洲委员会。
- Pingel, Falk ((2011 年, 即将出版), Intervention, Coordination, Cooperation: Ca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elp to build new identity patterns through reforming the teaching of the social studies in fragile societies?, 出自 Heribert Weiland 编著的 *Education in Fragile Contexts*, 弗莱堡: Nomos 出版社。
- Polonsky, Antony, Michlic, J.B (2004 年), *The Neighbors Respond: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Jedwabne Massacre in Poland*,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社。
-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European History in the Textbooks and the Teaching of Asian Countries (1959/60 年), *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für Geschichtsunterricht VII*, 169-192。
- Rémond, René (2006 年), *Quand l'Etat se Mêle de L'histoire*, 巴黎: Stock 出版社。
- Saaler, Sven (2005 年), *Politics, Memory and Public Opinion: The History Textbook Controversy and Japanese Society*, 慕尼黑: Juridicum 出版社。
- Schneider, Claudia (2008 年), The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 Controversy i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17(May), 107-122。
- Seo, Jungmin (2008 年), The Politics of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Contextualizing the Koguryo Controversy, *Asian Perspective*, 32(2), 39-58。
- Shibata, Masako (2005 年), *Japan and Germany under the U.S. Occup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st-war Education Reform*, 马里兰州拉纳姆: Lexington Books 出版社。
- Sin, Ju-baek (2005 年), Changes in the Explanation of Colonial Rule in Korean and Japanese Middle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1945-2005), 出自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Textbooks in Asian and Europe*, 180-238。
- Tu, Wei-ming (编辑) (1994 年),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加州斯坦福市: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社

- Vickers, Edward (2006 年), The Boundaries of Chineseness – history textbooks and nationalism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出自 Stuart Foster 和 Keith Crawford 联合编著的 *What Shall We Tell the Children? –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夏洛特: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出版社。
- Wang, Gungwu (2000 年),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马萨诸塞州剑桥: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社
- Wang, Gungwu (2003 年), Reflections on Networks and Structures in Asia, 出自 Melissa G. Curley 和 Liu Hong 联合编著的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hanging Social-cultural Interactions*, 香港: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3-26。
- Wang, Zheng (2008 年),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2, 783-806。
- Xu, Luo (2007 年), Reconstructing World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 1980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8 (3), 325-350。
- Yamane, Kazuyo (2009 年), *Grassroots Museums for Peace in Japan: Unknown Efforts for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萨尔布吕肯: VDM Verlag Dr. Müller 出版社
- Yang, Biao (2001 年),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Curricula in China, 出自 Alaric Dickinson 等人编著的 *Raising Standards in History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History Education, Vol. 3*, 168-180